

#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以突出文化建设？

——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视角的考察

徐秦法 刘星亮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 彰显着中国发展观的超越性和科学性。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方向性、内容性、正当性因素, 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文章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为视角, 阐明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推进全面发展和社会统筹协调, 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引导和力量支撑, 凝聚发展共识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文化建设; 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2) 12-0026-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sup>①</sup>, “‘十四五’时期, 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切实抓紧抓好”<sup>②</sup>。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作用。究其原理, 其一, 就文化本身的功能而言, 作为一种基础性、深层性、持久性力量, 其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价值引导、思想保证和力量支持。所谓价值引导, 是指作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等形态存在, 文化能够凝聚民心, 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之中; 所谓思想保证, 是指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不动摇, 能够保证现代化建设不走偏路; 所谓力量支持, 是指作为理论、知识性形态存在, 文化能够不断补充、优化发展理念, 并进行传播, 凝聚社会共识。其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 文化建设存在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环节中, 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物质和精神都要强。

具体到文化建设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用好红色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sup>③</sup>。文化可以调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进一步讲, 在中国的现代化

基金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JDSZKZ04);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YCBZ2021031)。

作者简介: 徐秦法,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 刘星亮,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年, 第309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年, 第310页。

③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 《人民日报》2022年8月19日, 第1版。

建设语境中,文化与精神文明有以下三种关系:第一,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sup>①</sup>。第二,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发展,倡导健康的文化风尚,用优秀的文化作品充盈人民的精神生活。第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内容上相近,均包含价值取向、舆论导向、政治方向等。如此,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和治理方式,对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 一、理论维度:实现全面发展和社会统筹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

实现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反思。物质财富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变革,同时加剧了社会利益的分化,造成了情感的隔离,冲击着共同体意识,突出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正比性”特征。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通过有意识的、主动的文化建设来调节社会利益,激发社会动力,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 1.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发展高度

物质文明代表着人类进行实践的物质能力,主要包括物质的积累量、生产技术的成熟度、生产规模的大小、生产效率的发展程度等,表征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物质支配程度等。精神文明是指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财富和成果,包括知识、道德、信仰、理想信念、政治立场,等等。

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影响着人的精神生活,为增强精神力量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起着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②</sup>,物质生产能力、分配方式等决定着人的精神生活的层次性和丰富性,精神活动始终不能脱离物质发展水平。换言之,物质财富在推动精神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文明对社会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作用。

资本逻辑下的物质文明,遵循着“以资为本”的发展逻辑,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将人类社会扭曲为“物质生产”的单一发展模式。在此逻辑之下,人的发展受到“物”的发展牵制,人的精神、情感不能全面、自由发展,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吸毒、抢劫”等严重社会问题。并随着生产的扩大化,形成全球性问题,如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局部战争不断,世界公平正义缺失,“世界理性”缺失,精神无序状态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难题。由此,追求物质积累的片面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当今世界趋势,人类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性难题。

事实证明,如果仅仅把物质财富作为人的精神资源,那么意味着,精神的不断“物化”,从而导致人的发展依附于物质的生产,形成“异化的人”“单向度的人”,人在发展中被物质撕裂。物质基础是精神力量的来源,但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力量,需要正确的思想引领。如此,现代化发展需要基于历史发展进行判断,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需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既要推动物质世界的进步,也要对精神世界进行变革。如此,进行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建设,是极其有必要的。

### 2. 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影响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新时代文明和道德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我们不能划这个等号”<sup>③</sup>。精神文明的发展不仅受到物质文明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制度、统治意识等因素的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③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影响。所以，精神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和物质文明亦步亦趋的，其表现为相对独立状态，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起着引导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sup>①</sup>工人产生社会价值，但是却不能对自身所产生的价值进行占有，这种异化现象包括精神领域。工人在生产劳动和实践活动中创造精神财富，理应满足自身精神需求，实现自身精神发展，但是在私有制下，工人自身创造的文化反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自身的工具。整个社会形成了与工人相对立的精神体系，压制着工人自身精神力量的发展。而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故意将自身利益追求置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挤压着广大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无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被欺骗、被误导和被防备的状态，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以“利己取向”作为物质生产和消费导向，导致了攀比、浪费等行为的产生，刺激了社会利益的严重分化，造成社会的分裂。长此以往，每个群体或个体只专注自身的利益追求，人与人之间交往受限，导致在社会共同问题上无法达成发展共识，形成阶级、阶层固化，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坚持以“集体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些都体现了“共享、平等”的精神文明追求，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这种精神文明引导下，个体理想与社会理想形成互动式结构，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被纠正、引导，从而确定下来，形成“主体性—公共性”两位一体的精神世界。这也说明，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精神领域的“所有制”问题。如此，我们的现代化不仅是追求经济层面的发展，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需要通过文化建设提升精神文明，巩固“集体主义”的物质生产价值取向，引导、规范物质文明的发展。

### 3. 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发展需要，为实现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

一些形而上学理论将人视为精神性存在，忽视了人的现实性，将人以“抽象性”展示于社会关系中，个体的“发展需要”以不正当性在场，制约着人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将人民群众作为“物”的附属品，将人的“发展需要”等同于物质积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物质形态的存在，也是作为精神形态的存在，以“意识”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指出人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为自身的生活需要从两个方面开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因此，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sup>②</sup>。

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发挥主动性。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区别于先前哲学家们专注于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主动改造世界。且“主动精神”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回答了中国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之问，如“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sup>③</sup>。而“精神主动”是理论实现普遍化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要素。将“主动精神”变为“精神主动”，是一个特殊到普遍、客体到主体的思辨过程，是理论与统治阶级、现实的人的结合过程，其能够激发群众的实践意识，以“主动精神”去积极创造、求变、求和平、求发展。

进一步讲，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统治需求和群众需求为“同一需求”，新时代表征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人需要去不断奋斗，获得利益。故这种利益便是一种主动需要，即是一种社会生产主体意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sup>②</sup>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149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页。

识到的需要。这样,“美好生活”内蕴着人民群众对物质财富和精神力量的双重需求,在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也是精神主动与主动精神作用的过程,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当前,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增强对现实的指导能力。

## 二、历史维度: 坚定理想信念和确保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应有之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与剥削的“精神武器”,精神姿态由“被动”转为“主动”。“文化建设”开始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新形态与视野重新回归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建设安排与规划,文化建设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构成了递进式发展的历史图景。

### 1. 1919—1949年: 精神文明领先, 物质文明尾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先进阶级和群众为主体,正确认识革命内容和方向,规律性预测社会发展,不断增强革命力量,为中华民族谋求生存道路。整个阶段以精神力量超越物质条件制约的逻辑展开,进而凝聚民心,引领革命条件的变革与改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确立了党的性质、纲领等。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进一步重申了最高纲领,并增加了党的最低纲领的内容。如此,统一的目标、思想,成为革命的精神引领,激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革命热情和意志。随着革命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落地生根,将“精神上的引领”范围由特定群体扩大到普通民众。特别是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理性客观阐述教条主义的危害,探索出了“实事求是”的革命方法论,而后又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不断推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朝着科学性与正当性方向发展,继而进行革命力量的建设。毛泽东还于1927年领导三湾改编,1929年主持召开古田会议,对军队进行整顿,严明军队纪律,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管理军队,建设了一支“人民军队”。同时,毛泽东纠正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错误”,消除党内分歧,并首次提出关于党员建设的党建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广大党员。并于1941年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确保党员干部思想上的先进性,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这样,党以自身的先进形象,团结一切积极力量,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的革命路线,到物质羸弱、革命意愿强烈的农村,宣传革命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真理,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革命勇气,积极参与反压迫的斗争,展现出了不怕牺牲、患难与共、至死不屈等可贵的精神品质,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打响了彪炳千秋的“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涌现了董存瑞等一批为理想信念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和人民英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真理,以莫大的热情与力量投入解放事业之中,以穿草鞋过雪山、吃树皮的革命物质条件和武装力量,取得了诸多超越现实局限的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的奇迹,而这种实践精神、革命意志、集体主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色。如此,中华民族“站起来”,开始进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以“精神独立与自强”为逻辑起点展开的,一系列的文化生产与活动在现实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2. 1949—1978年: 精神文明增进, 物质文明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新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开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巩固新生政权成为当务之急。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等作为精神指引,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安全,进行社会制度、旧思想、物质基础的改造与

变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

1945年毛泽东提出“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sup>①</sup>的目标,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集中强调现代化的重要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进行了客观分析,明确要发展生产力,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64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经过接续的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有制”工业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与巩固。这一时期,以物质性生产为主体内容的精神大量出现,包括“老西藏”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

同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便开展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各地积极创办“农民夜校”,提升群众的知识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1951年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sup>②</sup>,进一步推进马列主义在全国传播,强化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戒骄戒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1950年到1957年之间,党多次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重点弘扬“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崇尚奋斗,热爱劳动”的价值导向,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激发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开展“知青下乡”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让知识分子参与到劳动之中。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明确了精神生产“依靠谁”“为了谁”的宗旨,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现,文化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展现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

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度对阶级意识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追求现象,导致一些建设忽视了对客观环境的分析,脱离了现实条件,而单纯以“理念”“思想”作为真理进行导向式的实践。对精神力量的极度张扬,导致一些发展认知出现错误,产生了主观能动性与精神热情超越了实践能力的行为。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生产力所决定的时代限度,精神力量的发挥需与现实的条件相适应。

### 3. 1978—2012年:物质文明提升,精神文明跟进

党和政府坚持实事求是和改革创新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双重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有着鲜明的“党的领导、市场引导”特征。

在引入市场机制初期,生产力提高,物质财富增加,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物质力量的急速发展,导致物质和精神失调现象出现。过度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活动与行为,不断冲击着社会道德的约束,甚至法律的约束。部分人在正确信仰与社会现实之中,抛弃了信仰,选择了对利益的单向度追求,弱化了对“集体主义”的坚守。道德、信仰不是必须存在,或者是以“虚假形式”存在,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发展矛盾。“拜金主义”“道德无用论”的思潮流行,对个体造成精神困境,而又在社会活动与交往中将困境扩大,阻碍着群体的发展,威胁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性质相悖。在这种“物质追求”的导向下,社会问题出现了“新、多、杂”的现象,对传统的价值观、民族精神、政治信仰造成危害,需要先进文化和精神的滋养与供给,“精神文明”开始作为“政权导向”“道德导向”双重属性进行提倡。

在党的领导下,文化领域呈现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空间延伸的特征,许多新的文化建设概念、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2页。

要求出现。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培育四有新人，要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一极来抓。党的十二大报告将精神文明建设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三大报告将“文明”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识。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sup>①</sup>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确认了“文化产业”，强调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属性，精神产品的市场属性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要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文化生产力”概念也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对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做出工作部署。在市场化语境下，文化与市场不断融合，大量的剩余价值出现在文化领域，文化的发展空间从现实延伸到网络，重构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劳模精神等，体现着“开放包容、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的时代特征。

#### 4. 2012 至今：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理念，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党和政府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参与到文化的建设之中，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

这一时期，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文化建设有着新气象和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文化中精神功能的挖掘与培育，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概念，重视革命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多内容、多群体的传递文化自信建设的必然性和应然性，文化自信从宏观的社会场域逻辑转变到微观的生活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sup>②</sup> 同时，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三严三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史”专题教育，号召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还概括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丰富了新时代的文化内容；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坚持“两个结合”思想，引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并以此作为全社会的价值公约；重视家庭美德建设、提倡良好家风的培养，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十四五规划中，“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sup>③</sup>，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条重要原则，被鲜明地提出来，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涌现出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有着“团结一致、精准务实、开拓创新”的内涵，彰显着精神主动和自信。

通过文化建设，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sup>④</sup>，“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sup>⑤</sup>。全面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协调是“关系性”表述，表达两者力量对比的偏差，文化建设能够调整两者在发展中的关系，将两者以辩证性、立体式的关系呈现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全面”“协调”彰显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的同向、同质、同量的关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保障。

<sup>①</sup>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sup>④</sup>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sup>⑤</sup>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 三、现实维度：追求发展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之中看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关系，不能将两者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对内需要达成共识、凝心聚力，对外需要展示中国方案和智慧，反映科学性和共同性。而通过文化的宣传、塑造等功能，可以引导民众认识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的同等重要性，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展现中国的发展观，印证中国道路的正确性，进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形态，巩固现代化成果。

#### 1.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的大众认同，激发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sup>①</sup>通过文化建设，以文化人，可以达成发展共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集中华民族力量。

通过文化建设，不断重申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从而明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进而形成发展认同。人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协调认同，最根本的是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发展目标、现实价值和根本利益的认同上。在目标上，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党领导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最大底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两者协调发展，能够激发中国人民敢于实践、敢于斗争、善于创造的精神，以国家权力主人和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创造伟力实现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在价值上，党始终把人民作为执政价值主体，把人民作为决定现代化成败的根本力量，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引导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认同和道路认同，激发人民群众的行动自觉，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利益上，始终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完善为人民谋幸福的观念和制度，提升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条件，坚持同一一切错误思潮作斗争，保护人民利益，鼓励人民群众以主动、自信的姿态投入现代化建设之中。如此，使得党和人民的关系在两者协调发展中进一步紧密，成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武器，也成为文明新气象的体现。

#### 2.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转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sup>②</sup>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顶层设计，不是抽象的存在物，是在谋求发展和幸福的具体实践中实现和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理论，包含着人民的现实发展诉求和对社会理想的构建，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民的幸福”是现实的幸福，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全面幸福。“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美好生活”都是对人民群众“幸福”感的表达，表征着中国式幸福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有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蕴含着“命运共同体”本质核心，凝练了“要幸福就要奋斗”意识。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于不断满足人民从追求物质丰裕到精神生活质量的多样需求之中，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整体进步为视角进行实践探索。

这样，需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变民众的幸福观念、发展观念，弥补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裂痕，推进社会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

<sup>①</sup> 习近平 《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sup>②</sup> 习近平 《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变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幸福”的发展理念,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促进人不断实现自由与解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

### 3.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世界呈现,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与风范

中国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物质积累方面,能够集中力量,提高办事效率,发展更大的生产力,为美好生活提供物质来源。在精神生活方面,人民精神得到极大解放,思想道德素养提高,人民崇尚团结奉献,反对好逸恶劳等取向,能够形成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所展现的优势与效益,正是中国融入世界,展现大国担当的底气。

同时,全球化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面对世界发展问题,只有增强沟通,开拓国际视野,让世界人民共享世界的发展成果,才能化不利为有利,促进本国发展。中国注重国家层面的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sup>①</sup>,中国奉行多边主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在世界局部战争、气候等问题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作出突出贡献。面对全球疫情肆虐,中国坚持“团结合作,携手抗疫”,积极向世界其他国家分享防护经验,为各国提供了大批抗疫物资。并且,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理念,积极主动帮助其他弱小国家谋求发展,彰显大国风范。基于此,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可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明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基于对国内实践与国际发展两个大局的现实考量,体现独立自主的民族品质和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格局,从而让中国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并积极响应,进而共创美好世界。

### 4. 彰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意蕴,昭示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②</sup>，“从属”意味着地位上的不平等。西方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的野蛮张扬和扩张之上的,具有不可更改的历史局限性,本质上表现为文明的排他性、狭隘性,而非包容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观,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开放的现代化,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坚决贯彻新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联结,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协调性;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和封闭,秉承和合的方法论,加强文明对话,为世界发展提供智慧。

坚持以文载道,不断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和国家传播能力,把话语投向世界,更加全面、立体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论。在主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社会功能已经由传统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统治需要”历史逻辑转变为“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建设——共创美好世界”的现实逻辑,其所彰显的是民族价值和社会建设的不断契合,内在地表达着人的主体性得到凸显和张扬,印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雄厚的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并非对西方单纯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照搬,而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更新了以往社会“以权为中心、以资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符合人类文明进程,充实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无限潜力。

责任编辑: 张利明

<sup>①</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

---

## ABSTRACTS

###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minenc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from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Xu Qinfa Liu Xingliang (26)*

The coordinating advancement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progress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 which highlights the transcendence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view. Culture , as a directional , substantial and legitimate factor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 is unified with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ul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oling , offering the spiritual guidance and strength support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 moreover , building the consensus 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value.

### **Urban Growth in China: Course , Determinants and Tests**

*Su Hongjian (62)*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framework of urban growth determinants by synthesizing the historical dependence ,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migration cost , makes econometric test with Chinese urban data ,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s the typical cities' urban growth. The findings are: Firstly , with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China's urban growth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slow growth , rapid growth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 which constangely optimized the urban system. Secondly , using the IV ancient city walls in China , this paper tests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growth and urban size in base period , and their historical dependence. Thirdly , the spac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ndogenous wages , house prices and urban size deter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variables and urban growth. Forthly , the exogenous climate amenitie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urban growth , amo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the average minimum temperature in Januar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Lastly ,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restrict urban growth through migration cost. In light of the urban growth law , the city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urban residents , reduce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restricting the urban growth , and optimize resources allocation.